

【專題演講】

## 登山、文青與現代人—對十九世紀末 英國 Alpine Club 創會的一段意識史考察

詹偉雄

(製作人、文化評論人)

為何要去說英國，是因為任何大量人口行動都有其社會性與意識基礎，這幾年做西方現代登山史的研究，我的研究直覺是：台灣目前發展中的登山，在這一代，慢慢接上當年英國那一代。其實我知道，要登山者回答「為什麼要爬山？」支支吾吾是常態，東西方皆然。我零零總總在文獻裡搜羅了 300、400 個回答，總覺得辭不達意的居多，有些回答還帶著小小的愠怒，好似被冒犯一般，其中最著名的，就是英國登山家喬治·馬洛里回答美國《紐約時報》記者提問為何要爬聖母峰時所說：「因為它就在那兒！」

登山者被山所吸引是不爭的事實，但他們為何說不出來？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：置身於浩大的自然之中，人的知覺是透過身體的感官體驗而來，這個感動是「前語言」的，對一般人來說，那個巨大、神聖、抒情，有時不免涕淚交錯的「天人連結」，是在你找到恰當的字詞來描述它之前，就已經完成了的，而且最弔詭的是：任憑你用盡全力找尋到來的詞語，都覺得不足以指稱這種身心所經歷的巔峰經驗，甚或覺得有點褻瀆祂。

不管東方或西方，都有著兩極的看法。不冒險的人，看待這種孤獨行事之人有如寇讎，因為他切斷了社會紐帶，讓親人陷入了情緒的困境、失落的泥沼；但冒險家們則有另一種對立的視野：身體在各種困難的物理環境中，才得以真正地「認識」到世界，遠遠地看望一座山，在視覺上為之傾倒，並不算認識山；而是必須手腳並用地攀爬過嶙峋的岩塊，在幾次墜落的恐懼中一瞥深淵，跋涉過山徑到體力崩潰邊緣，這才識得山體之一二。老道的登山客屢屢克服險境，總覺得身體不再受限於自然的宏規，而有一種自由似的暢快，特別是對立於山下文明世界裡的各種老套常規、綑綁束縛，山上的生活具有淋漓盡致的掙脫鮮意，一上山，便不再容易下得山來。

19 世紀中葉，愛爾蘭籍著名的阿爾卑斯山區地質學家約翰·丁達爾（John Tyndall）稱呼這種矛盾交加的經驗為「死亡與美麗的世界」（the world of death and beauty），他在進行冰河研究時，常常在理性測量數據之時，分心於攀登的興奮與快感，而自我疑慮為何會受危險所吸引。他所不知的是一個新時代場景正緩緩升起：英國山岳界原先追求安全登山的主流，正悄悄地被另一種追求風險派所取代，阿爾卑斯山一座座未登峰快速地被英國來的冒險家攻克，每一條新路線的首攀，都是自我新生命的重新打造，冒險讓都市生活裡呆滯、反覆的機械人生，重新擁有一種日新又新的感受。1857 年英國山岳會（Alpine Club）的成立，對應的正是中產階級裡這種心智與性靈的自然化趨勢：我們眼前的世界，並非是用來冥想沉思的，而是要以一個「身體化的主體」（embodied subjects）之態勢來面對，主動地進入自然，讓自然川流過我們全身，反過來建立起吾輩生命的意義感。